



本文侧重讨论三个有趣的问题：一是“涉园”的名称并非张氏家族所独有，还有很多名园、名楼也有“涉园”之称；二是“涉园”二字从何而来？通常认为，取自魏晋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：“园日涉以成趣，门虽设而常关。”其实也不尽然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解说；三是还有一些命名为“日涉园”的园林，也与陶潜诗句有关，如上海书隐楼、江苏泰州乔园等。现列举几个有名的“涉园”及“日涉园”，略记如下。

张惟赤与涉园

张元济《涉园题咏续编》序中记道：“余家涉园，为大白公读书之处，创于明万历之季，逮螺浮公始观厥成……嘉庆丙寅，鸥舫公集而刊之。又数十年洪、杨难作，园始毁。”此中“大白公”是张元济十世祖张奇龄，世称大白先生，张惟赤之父。张奇龄曾主持杭州虎林书院，以学识渊博誉江南，晚年在海盐南门外筑“大白居”，避闹市以读书。“螺浮公”是张元济九世祖张惟赤，清顺治年间进士，授户部山东司主事，康熙初年出任山东乡试正主考。辞官归家后，将“大白居”拓建改名为“涉园”，致力于收藏书籍，渐成张氏家风。“鸥舫公”是张元济六世祖张宗松，号寒坪，诗人、藏书家。

按照张元济所言，张氏涉园本源于大白居，但“涉园”之名何来呢？1979年，张元济《涉园序跋集录》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，王云五作序解释：“涉园者，海盐张菊生先生元济之书斋也。揣其命名之意，殆谓涉水未深，自谦其为学之肤浅；实则菊老于旧学无不深究，尤以版本校勘为最，于新学也无不博通，故其处世致用之方，多令科学化也。”对于此说，苏精批评道：“王氏或不知涉园之名远承自明末张氏先祖，于跋文中但凭己意揣测张元济命名之意。”（《近代藏书三十家》）

陶湘与涉园

陶湘，字兰泉，号涉园，藏书家、版本

涉园的故事

俞晓群



看点

谈到“涉园”，人们首先会想到张元济。戊戌变法时，张元济因参与维新活动，受到清政府“革职永不叙用”的处分。1902年，张元济加入上海商务印书馆，此后他多次拒绝清政府邀请，一直在上海商务印书馆从事出版及古籍整理工作。

对于张元济余生投身出版之举，重要原因之一是他受到家世的影响。张元济先祖张惟赤早年继承张氏耕读家风，创建“涉园”，开始着意收藏图书。至乾嘉之际，后辈张宗松藏书之富达到顶峰。道光以后张氏中落，涉园毁于战火。到张元济时，只余涉园之名，无一册藏书留存。

在这样的背景下，张元济自号“涉园主人”，一生立志恢复祖业，四处搜寻先人旧藏，不惜重金收购。2017年，为纪念张元济诞辰150周年暨商务印书馆成立120周年，上海图书馆将张元济捐赠给原合众图书馆（现上海图书馆）的涉园旧藏文献整理出来，编成《上海图书馆藏涉园稿抄校本丛书》100册，2019年在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。

目录学家、刻书家。陶湘20余岁即锐意收书，居津后，时至京津书肆访购图书，若遇所好，不惜重金购之。他收书喜初印宽大、书品洁净、墨色十足，装订古雅美观之类古籍，尤酷嗜开化纸印本，一时有“陶开化”之称。傅增湘评价陶湘收书：“一书辄兼数本，一本之中又选其纸幅之宽展，摹印之清朗，以及序目题跋，必避其完善无缺，答题、封面必求其旧式尚存。往往一书而再易、三易，以蕲惬意而后快。入库之前，复躬自检视，重付装潢，被以磁青之笺，裹以靛布之函，包角用宣州之绫，订册用双丝之线，或过于购求之费，而毫不知吝。故持书入市，一望而识为陶装。”（《涉园明本书目跋》）1931年前后，陶湘藏书已达30万卷，而“官本精槧，居其泰半”。

至于陶湘藏书之地称“涉园”的由来，其子陶祖莱写道：“所谓芝兰生于泉侧，爱其水之清澈甘甜也。兰泉公称其藏书之处为‘涉园’，《易经》需卦所言‘光亨吉贞，利涉大川’，徒行历水为‘涉’，渡也；园者，可解为身心之家园，此二字颇具儒者历世之妙意。遥想兰泉公立身于乱世，汇集点滴承载中华文化源泉之古籍，也许便是其时君子稍可寄托身心的家园吧！”（《涉园续编》序）

治愈师”等网络标签。他仕途奔走的困顿、屡遭构陷的委屈、心系天下的情怀被轻轻带过，一生颠沛流离的悲愤几乎被完全抹去。“人生到处知何似，应似飞鸿踏雪泥”，本是历经沧桑后对命运无常的深沉体悟，却被简单解读为随性豁达。立体厚重的历史人物，就这样被扁平的网红人设替代。

文风的轻佻化，进一步消解了历史的庄重感。不少解读堆砌网络热词，用娱乐化语态解构古人一生。部分创作脱离具体历史背景，强行嫁接现代处世法则与成功学逻辑，将苏轼跌宕起伏的人生，包装成可供复制的“处世教程”。为迎合读者情绪偏好，文章只截取轻松讨喜的片段反复渲染，放大风雅与闲适，遮蔽苦难与坚守。

历史人物解读的娱乐化乱象，是市场、传播、创作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。流量逻辑主导下，严肃考据类作

陈洪绶与《涉园记》

陈洪绶，字章侯，幼名莲子，号老莲，别号小净名，晚号老迟、悔迟，明书画家、诗人。《涉园记》作于庚午年前后，此涉园位于诸暨郭外，为文人私家小园。“涉园”之名，由其兄请槎庵来先生所题。对此，陈洪绶写道：“予忆先生名时，众以为仅取诸‘日涉成趣’之义也。予能广其意，当不是乎止也。”陈洪绶是说，表面上看涉园的名字出自陶渊明《归去来兮辞》，但还可以拓展“涉”字的更多含义：一是进入之意，即日常在园林中休憩；二是经历之意，即十余年反复调整园中花木房舍布局，力求景物和谐；三是涉猎之意，“日涉经史、日涉古今”，喻说治学需要“精择迁改，动与时宜之为善也”。

黄兴祖与狮子林

惟则禅师俗姓谭，元代僧人，园艺家。元至正元年，他来到苏州，第二年弟子们为他建造禅林，命名为狮子林菩提正宗寺，简称狮子林（狮与师通）。此后几经易手兴衰，清乾隆年间，衢州知府黄兴祖买下狮子林，改名为“涉园”。乾隆三十六年，黄兴祖长子中进士，次子黄熙高中状

品门槛高、受众窄，而轻量化、趣味化的内容传播更快、收益更高。同时，戏说式写作无须严谨考证，创作成本低、周期短，拉低了文史普及内容的整体质量。新媒体传播生态持续助推娱乐化偏向，平台更青睐短平快、有笑点、有噱头的内容，娱乐化古人解读热度居高不下。这种传播差异反向倒逼创作端妥协退让，形成恶性循环。

过度娱乐化的危害潜移默化、影响深远。扁平化解读扭曲历史人物原貌，让公众对历史的认知停留于标签与段子，丧失深度体察时代与人物的能力。通俗历史一味戏谑，只会消解传统文化的厚重价值，成为消遣娱乐的工具。文体边界的模糊扰乱了图书出版市场，戏说随笔、历史小说与人物传记混为一谈，既误导读者，也挤压严肃文史作品的生存空间。长此以往，年轻一代难以建立对历史的敬畏之

心，不利于传统文化的良性传承。

整治这些乱象，需要各方回归理性、守住底线。读者应当提升辨识能力，区分趣味普及与恶搞戏说，保持独立思考。创作者当以严谨著作为标尺，在创作中尊重史料、有据可依，不虚构臆造、不片面截取、不刻意流量化包装。出版行业需细化图书分类，完善内容标注，扶持严肃优质的文史创作，引导历史传播回归真实、厚重、正向。

苏轼的可爱，绝不仅仅因为他会吃、会饮，更因为他在苦难中依然心系苍生，在沉浮中始终不失风骨，在风雨之中高吟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在垂暮之年道出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”。我们品读苏轼、回望古人，是为汲取穿越千年的精神力量，而不是把古人打扮成我们想要的样子。让苏轼做回苏轼，让历史回归本真，才是对传统文化最好的传承。

苏轼的可爱，绝不仅仅因为他会吃、会饮，更因为他在苦难中依然心系苍生，在沉浮中始终不失风骨，在风雨之中高吟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，在垂暮之年道出“九死南荒吾不恨，兹游奇绝冠平生”。我们品读苏轼、回望古人，是为汲取穿越千年的精神力量，而不是把古人打扮成我们想要的样子。让苏轼做回苏轼，让历史回归本真，才是对传统文化最好的传承。

海浮现，最终催生出一个决定：和父亲一起，在家门前建造一座花园。这个决定构成了全书最深层的叙事动力：以主动的建造来应对被迫的失去。诗中的父亲归来不需要条件——只需要一场雨、一个黄昏、一颗追忆的心。但黄鱼无法凭借一场雨就让父亲归来，他必须建造一座花园。这座花园首先是物质的，水泥砌成的水池，需要日常浇灌和打理的一草一木。物质的沉重对应着死亡的沉重，用石头和植物来纪念，比诗歌多了一层实在。

与梁鸿的《梁庄三部曲》相比，《花园与父亲》的非虚构品格显现出不同的质地。梁鸿以田野调查和口述实录的方式写作，用一个独立的观察者而非参与者的角度客观记录和叙述。黄鱼的写作恰好相反：他不是观察者，而是当事人。花园是他和父亲一铲一锄挖出来的。如果说梁鸿的非虚构是“记录他人的世界”，那么黄鱼的非虚构就是“拆解自己的内心”。

黄鱼写花园，遵循着这样一个情感逻辑：以种植来抵抗遗忘。植物死后仍在生长，替代逝者继续参与生者的世界。黄鱼的书写和花园的建造是同一个动作：都是将过往固定下来，让后来者有一个可以辨识、可以触摸的纪念坐标。文字与花园，不过是两种不同介质的种植。



元，为此他对涉园进行修缮，并更名为“五松园”。乾隆帝还令苏州织造把五松园做成模型送京，让长春园、避暑山庄仿造。民国初年贝仁元买下五松园，重建厅堂，并恢复冠以元代狮子林旧名。

陆锦与耦园

陆锦，字闾亭，流真，苏州人，曾任四川保宁知府。清雍正年间，他在苏州修建“涉园”，又名“小郁林”，即为“耦园”的前身。程章华曾撰文《涉园记》解说：“先生凿池引流，以通其中。建得月之台，畅斜之亭。绕曲栏不加丹雘，以掩朴素。庭中杂卉乔木，渗淡萧疏，无浓阴繁葩，壅障风月，更不令栋宇多于隙地，即所谓涉园也。”同治十三年，沈秉成购下涉园旧址，重新修缮，形成住宅居中、东西两园的格局，取宋人戴敏诗“东园载酒西园醉”之意。后易园名为耦园，取《论语·微子》“长沮、桀溺耦而耕”之寓意。

陈所蕴与日涉园

陈所蕴，字子有，明万历十七年进士，历任南京刑部主事、员外郎、湖广参政等职。陈所蕴于万历年间购得唐氏旧园，历时12年建成“日涉园”，与豫园、露香园并称“明代上海三大名园”，并撰写《日涉园纪略》，记录造园始末。陈所蕴晚年家族无嗣，日涉园转售陆明允。清乾隆二十八年，陆明允曾孙陆锡熊出资重修日涉园，易名为“书隐楼”。明清时期，书隐楼与天一阁、嘉业藏书楼并称江南三大藏书楼。

陈应芳与日涉园

江苏泰州日涉园最初为明代陈彦旧居，其孙陈应芳，字元振，南直隶泰州卫人，万历二年进士，官至福建布政司参政。万历年间，陈应芳在祖父陈彦的祖屋旧地修建住宅，同时倚宅兴建“日涉园”，著有《日涉园笔记》。此日涉园又有三峰园、蛰园、乔园之称，是苏北地区现存最古老的园林，有“淮左第一园”之誉。

“不服周”，是楚人面对周王室体制性轻视与中原文化偏见的集体反抗。楚人的“不服”，根植于数百年的屈辱与抗争。在《不服周：楚国的奋斗与沉沦》这本书中，以楚国800年兴衰为脉络，围绕楚人的“不服周”精神，讲述了楚国从蛮荒立国、奋发图强到鼎盛衰亡的历程，剖析了楚人风骨与楚国的兴衰得失。

而“不服周”，也成为烙刻在楚人基因里的印记代代传承。直到今天，湖北、湖南方言里还有“不服周”这个词。

在别鸣《涉江的青铜》中，我们依然能看到楚人身上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烈性。涉江，取自屈原《涉江》，寓意楚人的不屈、独行、不与浊世同流；青铜，是楚文化的代表，象征楚人的硬气、刚烈、不服软。

书中收录了《双桨》《锈象》《过滩》《涉江的青铜》等11部中短篇小说，聚焦三峡大坝蓄水、故土淹没、移民离散背景下，那些被时代抛弃，却偏不认命、不低头的小人物。他们中有航道变了、码头没了，生计被冲垮，却不怨天不怨地，偏要闯滩过峡的老船长；有工役没了，却不妥协、不认输，凭自己的双手维持尊严的矿工……他们被浪潮推搡，身陷困顿，却敢于指天骂骂：老子就是“不服周”！

又是端午，粽叶飘香、龙舟竞渡。隔着熏艾的烟雾，我恍惚看到，一群楚人怀着满腔怒火发出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”的复仇誓言；又恍惚听到，今日的武汉街头，顶着烈日骑行的外卖小哥咬着牙说“就是不服周”。我想，2000年前的刚烈与2000年后的倔强，其实并无分别。

于是我忽然懂得，我们所纪念的，不只是一个殉道守志的文人，更是一种藏在楚辞里，融于楚魂中，傲骨不屈、桀骜自强的人文精神。



就是“不服周”

姚雪痕

公元前278年五月初五，天阴沉沉的。62岁的屈原披散着头发，徘徊在汨罗江畔喃喃自语：“亦余心之所善兮，虽九死其犹未悔。”

此时，距他第二次被逐出郢都已经过去了16年。只身漂泊沅湘的日子里，虽然看不见朝堂的战报，但他心里清楚，局势已经坏得不能再坏。自两年前起，秦军不断向楚国边境施压，而楚国只能靠“退地求和”换来短暂的和平。

到了这一年，秦昭襄王命大将白起领兵大举攻楚。楚军接连溃败，秦军顺势长驱直下，迅速逼近楚国都城郢。楚王慌乱逃往陈地，郢都就此失守。秦军入城后，焚毁宫室，捣毁楚王先祖陵寝，郢都被划归秦国，更名南郡。

消息传到沅湘，屈原整个人近乎崩溃。于他而言，失去郢都的楚国，再不是那个自立称王、陈兵洛阳、问鼎中原，公然宣称“不服周”的楚国；也不再是那个拍着胸脯说“我蛮夷也，不与中国之号谥”，骨子里透着蔑视权威、不甘桎梏血性的楚国。

这一天的屈原清楚地认识到，他的美政理想与残酷现实之间，已经没有弥合的可能。所以，他选择了以身殉道。

有人说，屈原目睹楚国山河破碎、大势已去，投江自尽不过是逃避现实的怯懦之举。说这话的人，许是你并不了解这位楚地先贤。以他的才干，如果改事他国，相信会是无数君主争相接纳的座上宾。他没有做出这种选择，是因为，楚国既是家国，也是信念的寄托，他宁愿一死也不愿背叛自己毕生的追求。

这不是怯懦，而是极致的不屈，是血脉里流淌的“不服周”的执拗。

“不服周”，是楚人面对周王室体制性轻视与中原文化偏见的集体反抗。楚人的“不服”，根植于数百年的屈辱与抗争。在《不服周：楚国的奋斗与沉沦》这本书中，以楚国800年兴衰为脉络，围绕楚人的“不服周”精神，讲述了楚国从蛮荒立国、奋发图强到鼎盛衰亡的历程，剖析了楚人风骨与楚国的兴衰得失。

而“不服周”，也成为烙刻在楚人基因里的印记代代传承。直到今天，湖北、湖南方言里还有“不服周”这个词。

在别鸣《涉江的青铜》中，我们依然能看到楚人身上这种天不怕地不怕的烈性。涉江，取自屈原《涉江》，寓意楚人的不屈、独行、不与浊世同流；青铜，是楚文化的代表，象征楚人的硬气、刚烈、不服软。

书中收录了《双桨》《锈象》《过滩》《涉江的青铜》等11部中短篇小说，聚焦三峡大坝蓄水、故土淹没、移民离散背景下，那些被时代抛弃，却偏不认命、不低头的小人物。他们中有航道变了、码头没了，生计被冲垮，却不怨天不怨地，偏要闯滩过峡的老船长；有工役没了，却不妥协、不认输，凭自己的双手维持尊严的矿工……他们被浪潮推搡，身陷困顿，却敢于指天骂骂：老子就是“不服周”！

又是端午，粽叶飘香、龙舟竞渡。隔着熏艾的烟雾，我恍惚看到，一群楚人怀着满腔怒火发出“楚虽三户，亡秦必楚”的复仇誓言；又恍惚听到，今日的武汉街头，顶着烈日骑行的外卖小哥咬着牙说“就是不服周”。我想，2000年前的刚烈与2000年后的倔强，其实并无分别。

于是我忽然懂得，我们所纪念的，不只是一个殉道守志的文人，更是一种藏在楚辞里，融于楚魂中，傲骨不屈、桀骜自强的人文精神。

枕边书

荐书人：祝勇

艺术学博士，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、故宫文化传播研究所所长，知名作家、学者。长期深耕故宫文化与文物南迁史研究，著有《故宫文物南迁》《故宫六百年》等作品。

本期推荐：《国家记忆：故宫文物南迁史》

我目前正在读《国家记忆：故宫文物南迁史》。这本书是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森先生的力作，聚焦抗战时期故宫文物南迁的壮阔史实，完整记录了9000余箱故宫文物为躲避战火、辗转万里的护宝迁徙历程。

这本书给我印象最深刻之处，在于它跳出了单一的故宫叙事，将文物南迁这一事件上升到国家记忆、民族文脉的层面，清晰诠释出这场文化迁徙，是发生在中华民族危亡之际守护文明根脉的史诗壮举，是中国抗战史上极具分量的文化大事。

书中采用了大量全新挖掘的档案文献，内容翔实严谨，其中许多珍贵资料是过往相关著作未曾收录、未曾公开的，史料价值极高，是读懂故宫文物南迁、铭记民族文化坚守的佳作。

本报记者 刘臣君 整理